

现了一批涉及民族关系的历史
涉及少数民族民族性的想象。这些
《王昭君》¹，此外相关的还有郭
(1958)等。

步形成并趋于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共荣，淡化甚至弥合历史上曾经有
禹在谈到为什么要写王昭君，又为
交给我的任务啊！从提笔到完成，
领导同志在一起吃饭，谈起现在汉
。但这种情况又不是一个命令就可
代不是有个王昭君嫁给匈奴的故事
个任务非常光荣，非常重要。这使
是民族通婚问题，但熟知中国历史
问题，而是民族的融合和现代民族
的意图当然有着自己的领悟，并试

高度，向艺术家提出了要求。这是
求和这种政策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的民族政策进行想象性的补充和阐
愿望最终都呈现为叙事的“缝合想

成熟的想象材料。在所有的中华传
，传统的家族血亲文化受到了前所
学想象和国族融合策略中，它较之
若的剧作《蔡文姬》中，作者借助
匈奴单于说：“我听说，我们匈奴人
”《文成公主》开首即唱道：“汉

始在唐蕃联姻的时候。一千三百年前
生，受大唐‘驸马都尉、西海君王’
朝历史，颂赞唐朝与吐蕃血缘相连的
上的血脉追溯，为现实中的民族融合
的依据。

消费时代的情感印象

——中国当代文学与批评的文化观照

方维保◎著

XICONFEASHIN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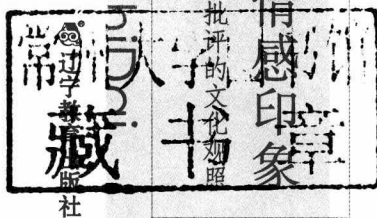
辽宁教育出版社

消费时代的情感印象

——中国当代文学与批评的文化参照

方维保◎著

XINCE DISC



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费时代的情感印象——中国当代文学与批评的文化观照 / 方维保
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82-8960-2

I. ①消… II. ①方…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6526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20.25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 放 责任校对: 彭力胜 金丹燕
封面设计: 王 萌 版式设计: 王 萌

ISBN 978-7-5382-8960-2

定 价: 38.00 元

文本细读与文化批评

——方维保《消费时代的情感印象》序

孟繁华

当下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在今天的命运几乎是悲剧性的，对文学批评指责、不满和怨恨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尽管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凡是对当下文学批评深怀不满或怨恨的人，其实对文学批评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了解。文学批评同样也需要批评，有说服力的批评对任何领域都是需要的。文学批评当然也概莫能外。但对不了解批评情况或者没有了解愿望的批评，实际上并不构成批评。这种情况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今天文学批评的某种处境。

即便如此，将文学批评和研究当作“志业”的仍大有人在。青年批评家方维保就身在其中。多年来，经常读到他的批评文章。《消费时代的情感印象》就是他从事文学批评以来的部分成果。文集凡五辑：作品论、作家论、现象论、批评论和地方作家作品论。通读这部批评集，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有两点：第一点是方维保文本细读的功力。事实上，一个批评家的看家本领，就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一出高下立判。一部重要的作品总会有不同的评论出现，但总有说得最好的。这个“好”当然不仅仅是赞誉，而是在紧要处说出了一般人难以或不能看到的东西。比如他的《民族国家的整体愿望》，是对《文成公主》和《王昭君》的合论。这是两部在当代话剧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话剧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对其多有论述。但他从国家民族共同体和文学想象的“缝合”入手，使这两出戏得到了新的阐释。他通过余华的《活着》，看到了这是“走着这样一条道路的不只是余华一人而是整个的先锋派。所以说，《活着》只是一个开端，它的发表是先锋派走向回归的庄严的仪式”。因此，“《活着》是余华先锋小说创作的轰轰烈烈的终结仪式，也是它的成年仪式”。这样的判断显示了方维保良好的文学史知识的训练，使他的批评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再比如他对许春樵《放下武器》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件“不关武器的精神事件”。他在具体阐述时说：

许春樵给这部小说的题目是“放下武器”，而在《放下武器》之前作者曾发表过《缴枪不杀》。假如把两部小说的标题加在一起，就是一句完整的战场用语“放下武器，缴枪不杀”。而且两部作品表现内容也非常相似，都写的是县乡干部的官场生活。许春樵善于表现县乡干部的生活，这是许春樵写作的独特性。但为什么叫“缴枪不杀”和“放下武器”呢？很难令人想得通。这两句战争用语，是革命时代传达革命意识形态的

艺术作品经常呈现的场面，当然也是儿童游戏中最常见的语言。郑天良出名于也成就于革命时代，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他获得了“武器”，这个“武器”铸造了他。但这样的武器在后革命时代却日益显示了它的笨拙和无奈，它被后革命时代的信仰与事实分裂的处境所困扰，被这一时代的商品浪潮锈蚀着，直到在某一天被彻底粉碎的时候，这样的武器不但是被“放下”了，而且是被扔掉了。

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对许春樵《放下武器》最好的评论。应该说许春樵是一个被埋没的作家，他创作的《男人立正》和《放下武器》理应得到更好的研究和评论。在方维保的这部评论集中，类似精彩的批评文字随处可见。这确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方维保的批评能力和眼光。

第二点是他对文化研究方法的娴熟。《消费时代的情感印象》的副标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与批评的文化观照”，这里的“文化”显然不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或西方文化的“文化”，而是文化批评的“文化”，“文化观照”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研究”。在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诸如“性别差异与精神同构”、“男性的困境”、“异性排斥”、“家族伦理与阶级神话”、“文化断裂的焦虑与纾解”、“身体的欲望与灵魂的救赎”、“女性想象”、“知识崇拜与性别政治”、“消费时代的爱情症候”、“左翼语境中的话语重构”等概念和标题。这里的许多概念都是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而在具体论述中，他使用的也多为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比如他在论述新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主题时，一方面分析了“佳人”在历史时间方面的变迁、身体和身份的变异，分析了女性的“知识崇拜”；一方面深刻指出了“才子佳人叙事的场景设置，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为男性主人公搭建一座表演自己才华的舞台”，“那些才子们，如高加林、章永麟（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庄之蝶（贾平凹《废都》）、高子路（贾平凹《高老庄》）、金狗（贾平凹《浮躁》）、姚敏生（张弦《银杏树》）之所以能够为美女们终身不渝地苦恋着，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点才气”。这个分析是太有意思了。但更重要的是，“知识崇拜已经被发现存在于这样的才子佳人模式中，但是这还不是最本质的，因为在这样的知识崇拜的背后，还包涵着一种男性的权力，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在爱情的、知识的迷雾背后是一种冷酷的性别政治”。这样的分析与那种所谓的“颠覆男性”的胡言乱语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说文化研究或曰文化批评已经是方维保从事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而他对文化批评的理解和运用，也给人一种严谨和在行的感觉。

方维保先生虽然还很年轻，但已经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多年，他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他已经是一个正在成熟的文学批评家。

是为序。

2010年8月10日于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作品论

- 一、民族国家的整体愿望 —————● 001
——话剧《文成公主》《王昭君》合论
- 二、血缘幻象与性别政治 —————● 012
——论长篇小说《朗园》
- 三、叛逆与回归：先锋派的终结仪式 ———● 020
——论长篇小说《活着》
- 四、是孝子贤孙，还是逆子贰臣？ ———● 029
——长篇小说《浮躁》《白鹿原》合论
- 五、欲望·审美与男性哲学 —————● 037
——论长篇小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 六、家园的失落与灵魂的漂泊 —————● 043
——论中篇小说《寻找土地》
- 七、投降，不关武器的精神事件 —————● 048
——论长篇小说《放下武器》
- 八、人民性与穷人的道德理想主义 ———● 056

——论长篇小说《男人立正》

九、灾难、叙述及相关的道德问题 ——• 063

——论中篇小说《天灾》

第二辑 作家论

一、流浪的帐篷：性别差异与精神同构 ——• 071

——三毛、金庸比较论

二、两难：国家意念与市民情怀 ——• 079

——张恨水、金庸小说比较论

三、生命势能存在方式与张扬途径 ——• 088

——阿城小说论

四、男性的困境想象与异性排斥文本 ——• 095

——苏童小说论

五、知性天空中的歌唱 ——• 100

——非马诗歌创作论

六、复式叙述与道德结构 ——• 108

——许春樵小说论

七、生存恐惧的诗意触摸	118
——潘军小说论	

第三辑 创作综论

一、家族伦理与阶级神话	151
——论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小说	

二、文化断裂的焦虑与纾解	163
——论 80 年代文化寻根小说	

三、本体创构的文学史意义	172
——论新时期小说的叙事演变	

四、身体的欲望与灵魂的救赎	186
——论新时期小说的性恋叙述	

五、知识崇拜与性别政治	199
——新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主题阐释	

六、消费时代的爱情症候	211
——21 世纪初若干情爱小说主题阐释	

七、形象、叙述成规与启蒙遗产	224
----------------	-----

——论 80 年代文学的女性想象

第四辑 理论与批评

一、后革命时代的话语经验 ————— • 236

——王蒙文学批评论

二、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 ————— • 248

——对王晓华先生批评的回复

三、原旨的缝隙与阐释的苦难 ————— • 256

——论十七年时期的文艺论争和批判

四、左翼语境中的话语重构 ————— • 267

——论当代文学的修改/重写现象

五、科技与审美双重观照下的界定 ————— • 276

——论“网络文学”的概念

第五辑 创作短评

不息的家园之恋 ————— • 285

——朱希和创作小论

岁月之性，生命之心 ————— • 287

——读董金义散文集《庸常岁月》

妙文如酒 289

——小议周德芳《天涯芳草》中的散文和诗歌

童话：梦想的住所 290

——读司旌霞的《星星并不遥远》

生命的季节如行云流水 292

——读谈正衡的散文

涌动的欲望，象征的情绪 294

——读朱希和的散文集《家园之恋》

亲情的生活，亲情的诗 296

——读汪明松诗集《老灶》

一颗真诚的心 297

——序汪明松散文集《匆匆岁月》

躁动时代的优雅风范 300

——读韦斯琴的散文

杂色：生活与艺术 304

——近年芜湖小说创作略观

黑白对弈中的人性张力 307

——论孙志保的小说创作

后记 311

第一辑 作品论

一、民族国家的整体愿望

——话剧《文成公主》《王昭君》合论

内容提要：《文成公主》和《王昭君》是20世纪50年代关涉民族关系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话剧。面对历史记忆中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些历史剧在红色背景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民族关系策略的支配下，调动了传统和现代的多种文化资源，对现代民族国家进行了“缝合想象”。

在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当然也是文学充满想象的沃壤。在20世纪的50和60年代，曾经出现了一批涉及民族关系的历史剧，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涉及少数民族民族性的想象。这些作品主要有田汉的《文成公主》（1959）、曹禺的《王昭君》¹，此外相关的还有郭沫若的《蔡文姬》（1959）、田汉的《关汉卿》（1958）等。

红色背景下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趋于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立足现代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强调民族关系的和谐共荣，淡化甚至弥合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民族裂痕，这是当时历史时代的国家政策。曹禺在谈到为什么要写王昭君，又为什么要改变她传统的形象时说：“这是周总理生前交

1. 话剧《王昭君》虽作于1978年，但也可看做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产物。曹禺在创作谈中曾说，这是50年代周恩来总理给的任务，自己的创作是为了完成总理的嘱托。

给我的任务啊！从提笔到完成，已十多年了。大概是在1960年，有一次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一起吃饭，谈起现在汉族妇女不愿嫁给少数民族。周总理说，这可不大好。但这种情况又不是一个命令就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舆论宣传宣传，提倡提倡。古代不是有个王昭君嫁给匈奴的故事吗？接着就对我说，你就写一个吧！我听了感到这个任务非常光荣，非常重要。这使我下定决心去完成。”¹周恩来和曹禺等本来谈的是民族通婚问题，但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民族通婚问题向来就不是单纯的婚姻问题，而是民族的融合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稳定问题。作为艺术家的曹禺对国家领导人的意图当然有着自己的领悟，并试图从艺术上作出反映。

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着眼于民族国家的高度，向艺术家提出了要求。这是民族国家策略的清晰的表述。而曹禺等人对这个要求和这种政策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在创作关涉民族关系的历史剧中试图对这一时代的民族政策进行想象性的补充和阐释。国家意识形态的民族关系策略和文学主体的愿望最终都呈现为叙事的“缝合想象”。

1. 血亲、女人与国族整合的家族资源

在所有的中华文化资源中，传统文化的资源是最为成熟的想象材料。在所有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中，血亲是最为本位的。就是进入现代，传统的家族血亲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但作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学想象和国族融合策略中，它较之于其他文化元素仍然是一种优先选择。所以在郭沫若的剧作《蔡文姬》中，作者借助于匈奴单于之口确认了血亲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匈奴单于说：“我听说，我们匈奴人是夏禹王的苗裔，匈奴人和汉人本来就是兄弟嘛。”《文成公主》开首即唱道：“汉藏一家，开始在唐蕃联姻的时候。一千三百年前吐蕃英主诞生，受大唐‘驸马都尉、西海君王’印绶。”追溯历史，颂赞唐朝与吐蕃血缘相连的历史。时间上的血脉追溯，为现实中的民族融合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1. 《曹禺同志谈新作〈王昭君〉》，原载《解放日报》1979年2月4日。

在血亲纽带中，女性无疑是这一纽带的结点。在自然的意义上，正因为有了母亲才有了兄弟姐妹，才有了种系和族系的繁衍和流传。在人类历史中，嫁娶往往是不同族系的和解和联合的象征仪式。在本民族内部是如此，在不同民族之间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中，民族的联姻是常见的民族联合的方式，在历史话语中常常被表述为“和亲”。

在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中，和亲叙事虽然不多，但却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其中发生于汉唐两代的王昭君和亲匈奴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历来都是戏剧文化表现的热点。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想象中，缔结血亲联盟显然是最为重要的途径。而要实现这一结盟目标的唯一资源就是女人，而且是具有皇家名义的女人。因此，和亲是和解的符号；而女人在政治的和解中就成为使者的角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涉民族关系的历史剧都不约而同地赓续了传统的文化资源运用策略，把女性作为调整民族关系、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目标的首选资源和想象的材料。在《文成公主》等浪漫主义历史剧中，大都以爱情为线索来结构民族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女性的身体被赋予了弥合和超越狭隘种族的力量，无一例外地成为民族穿合的“红线”。在《王昭君》中，汉元帝、呼韩邪单于更是正面斥责反对派，主张和亲。显然，和亲被认定为民族和解的象征。女人之所以在民族和解中是首选的资源，最重要的在于通过女体可以构筑一种超越性的亲缘关系。剧作家郭沫若显然在潜意识中感受到了这种亲缘关系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在《蔡文姬》中，蔡文姬之子女角色的设置，以及对蔡文姬归汉前后难以割舍的“去往两情兮难具陈”的内心波澜的细致刻画，都极其有效地强化了剧中汉匈血脉相连、情感相依的意味。虽然“有大国主义的臭味”的围田司马副使周近的破坏，但双方赤诚相见，最终是匈奴人和汉人“真正成为一家”。

《文成公主》《王昭君》都涉及民族关系中的女性以及女性在协调民族关系时的作用。“和亲”本来是民族关系矛盾激化时期的一种妥协屈辱的做法，

但在这些历史剧中都被处理为民族团结的纽带。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学想象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都是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在政治集团和民族集团的交易中，女性只是作为礼品。也就是说她是不具备个性的“物”。也就是作为女性，在文学和文化的叙事中，她们是物化的。民族关系中的女性，自身的个性被阶级利益、国族利益所牺牲。50年代曾被誉为妇女解放的时代，但也就在当时，在曹禺的《王昭君》、郭沫若的《蔡文姬》和田汉的《文成公主》等几部由周恩来指导写作的反映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剧作中，阐释了国家意识形态与女性的关系，女性形象由受动的赠品充当者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和解的维护者。无论是文成公主还是王昭君都充当了维护民族关系的使者。《王昭君》中的王昭君被塑造为明大理、识大体的民族友谊传播者；不同于过去文学作品中的那个哭哭啼啼、满腹怨恨的妇女，而是积极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使者。正如曹禺所意识到的，王昭君在“进宫之后，她受不了冷落，就在匈奴单于向汉元帝求亲时，自愿请行远嫁匈奴，直到终老。在古代，一个女子离开自己的家是相当不容易的，何况只身远嫁异域，这说明她是一个性格很坚强、很了不起的女子。而汉族与匈奴，本是统一的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历史的趋势，使汉族与匈奴族都要求和平共居。她到了匈奴以后，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就大大好转，双方有五六十年的和睦相处，没发生过战争。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周总理读过很多书，知识渊博，而且十分善于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人物。他认为王昭君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祖国有过重大贡献，应该歌颂。董必武同志也有过四句诗赞颂王昭君：“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懣，舞文弄墨总徒劳。”¹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考察，女性身体作为政治资源，是具有它的父权制的痕迹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中，女性的身体又在血亲的意义上起到了民族黏合作用，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的和伦理的基础。

1. 《曹禺同志谈新作〈王昭君〉》，原载《解放日报》1979年2月4日。

2. 国族整合中的阶级、人民资源

虽然女性的身体是 60 年代民族缝合的最重要的资源，但当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以想象资源的方式进入到创作家的缝合想象之中。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阶级斗争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具有无可置疑的现代性特征，那就是，从它产生时起，它就告别了传统文化的血亲家族而依照经济利益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阶级理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跨民族的特性，具有了超越民族血缘鸿沟的功能。正因为如此，阶级理论自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国家整合想象中的不可或缺的资源。

作为 60 年代的作家，曹禺、田汉等人对阶级理论民族融合作用是有着心灵的感悟的。文成公主外嫁吐蕃，这本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贵族和亲故事。但田汉的《文成公主》在本事之外设计了顿珠和达娃的凄惨的爱情故事。弘化公主的使女叫达娃，依照弘化公主的讲述：“她是玉树牧民的女儿，她家世代代给一个大牧主当奴隶，她阿爸活活给大头人折磨死了，娘女俩相依为命。她跟一个叫顿珠的看羊的孩子定亲了。帕拉大头人见她美貌，定要收她。这孩子见情形不好，跟一个西域商人的骆驼队逃到我们这儿来了。商人们哪存什么好心，把她卖给我们一位关官，关官见她美貌，把她献给可汗，可汗让她做了我的宫女。我也怪疼这孩子的。教她汉话——”¹在这一段弘化公主的讲述中，其中的“阿爸”“娘女”等下层百姓的称谓都不符合弘化公主的身份语言，显然公主的语言在模仿下层语言，她的身份也被下层化。这个牧民受到大奴隶主的压迫，其女儿颠沛流离的故事，是一种典型的阶级故事。而牧民昂噶所说就更具有阶级的意味了：“不，我是说您没有把牧民的苦楚给唱出来。牧民没有自己的牛羊，牛羊都是头人的，要是死一只半只的就够他受的了。”“他们得睡在牛羊圈门口挡野兽。”而文成公主的行为则具有那个时代里文艺想象中常见的访贫问苦的中国共产领袖的特点：文成公主把达娃阿妈做的羊羹汤送给了强巴大娘。命令达娃：“你快跟顿珠到强巴大娘账房里看看去，老大娘病了，把羊羹汤分

1. 田汉：《文成公主》，《田汉文集（7）》，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3 年，第 300 页。

些给她吃。”在《王昭君》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温敦侯爷射死了牧民，牧民的儿子小玛纳受到王昭君和奴隶苦伶仃的同情。并引用民歌：“头发如韭菜，割了还会长。脑袋如公鸡，砍掉还打鸣。侯爷大人们不可怕。小民从来不可轻。”以苦伶仃为符号的下层劳动人民充满着对和平和匈奴一家的渴望。

这是那个时代盛行的阶级故事的讲述模式。话剧《关汉卿》所给定的历史语境更是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元朝。这种反力量还具体化为一种民族歧视政策。话剧《关汉卿》由于历史背景涉及中国少数民族王朝元朝，因此也涉及民族关系，也有民族关系处理的问题。《关汉卿》中对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进行了表现，作品通过监狱中人的口揭示了元朝“杀一个汉人还不如杀一匹驴”的严酷的民族压迫的现实。主人公刘长生被逮捕和被杀，是因为“汉人”的原因；王著杀死阿哈马，依照元朝的法例，“王著杀阿哈马尽管对，但是汉人杀蒙古人、色目人就有罪”；剧中的统治者也大多是阿哈马、忽辛等这些蒙古族人。戏剧家关汉卿的形象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民族抗暴英雄的特质，剧中的狱吏称赞他说：“关汉卿，你对，你若真照他说的招供了，我们汉人又该倒霉了。”

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无疑是民族之间的离间力量。但作品虽然也对民族矛盾有所呈现，实际这样的矛盾却是处于压抑的处境，相反，代之的却是阶级矛盾的叙述。《关汉卿》是纪念戏剧家关汉卿诞辰三百年而作。剧中的统治者大多是蒙古族人，因为他创作的主导动机不是为了完成歌颂民族团结的任务，而是为了塑造一个具有阶级意义的伟大的文学家形象，因此，阶级意义与民族意义就显得极致的胶结。剧中的民族界限仍然存在，但是又是被淡化了的。作家有意将匈奴统治者和汉族奴才“设计”为统治阶级。尽管王和甫这一变节汉奸形象的设置隐含着汉民族的民族主义诉求，侠义英雄王著的被杀显然有着民族歧视的背景，但作者最终将其处理为反贪官豪强的类《水浒传》式的英雄，以及与阶级相关的“那种强烈的正义感，那种不可征服的是非之心，那种‘为民请命’的斗争精神，最后都要在‘VIOLIN AND ROSE’的情结中被赋予一种